

# 何以优异：一项对优秀底层大学生的质性研究

——基于文化资本理论的审视

阳科峰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要:**以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的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底层家庭生活和文化实践对大学生的影响。来自底层家庭的学子在大学中面临着社交排斥、难以得到适切的情感支持等问题,在职业规划上也有明显的信息劣势。裹挟着负罪感的进取心、刻苦努力的惯性优势、个人发展的权宜智慧是底层大学生突破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和发展视野局限性,在陌生文化场域下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密码。

**关键词:**学业成就;文化资本;底层大学生;文化密码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21)02-0060-10

伴随着愈演愈烈的“寒门再难出贵子”的争论,教育作为社会筛选、分配人才和实现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工具,不可避免成了被关注的焦点。现阶段,学者用以研究影响教育对社会结构传递作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理论模型,这其中,文化资本的研究占据了重要位置<sup>[1-5]</sup>。但“文化资本”理论产生于布迪厄对西方资本与社会关系的审视,其在我国的实践与运用尚需转换和本土化<sup>[6]</sup>。引入文化资本理论思考我国教育问题或者解释“寒门再难出贵子”现象,面临着下列问题:(1)文化资本理论是否能解释中国所有来自底层家庭学生

的困境;(2)具体到产生“贵子”的主要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学生的底层经历又会给他们带来何种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并如何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轨迹,这是“文化资本”理论本土化过程中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本研究以H大学的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为例,分析他们不同的文化经历,从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大学生活中找到寒门子弟在大学阶段获得突破和成长的文化钥匙,进而阐明底层经历给他们通向精英生活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重新审视文化资本和底层经历在学生自我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收稿日期:2020-12-28

作者简介:阳科峰(1997—),男,湖北天门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原理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

注:本文曾于第26届台湾教育社会学论坛暨2020届国际社会学会期中研讨会宣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永久、清华大学博士后安超和北京师范大学讲师程猛为本文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特此致以真挚的感谢。本文文责自负。

## 一、文化再生产与文化流动之间的张力

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并把文化资本分为具身性资本(如学识、修养、性情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制度性资本(如书籍、纪念碑、机器、绘画等)、体制性资本(如文凭职称、证书和资格认证)等三类。他把掌握多少中上层高雅文化作为文化资本存量的衡量标准,并指出中产阶级子弟习得了较多的文化资本,并正好与学校文化相适应,所以更容易在学校教育中取得成功;而工人阶级子弟三种文化资本的含量都处于劣势,所以更容易在学校教育中失败。因此,文化资本起着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作用<sup>[7]</sup>。其后,凯伦和马斯的研究表明,比起劣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具有文化资本优势的学生更容易实现从高中到大学的自由衔接<sup>[8]</sup>。耶格在对社会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丹麦的研究中发现,文化资本存量更高的学生在获致优质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再次验证了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sup>[9]</sup>。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文化资本对于来自底层家庭学生的社会流动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迪·玛吉奥的文化流动模型揭示了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另一种可能性。他的研究发现,比起父亲教育水平较高的学生,文化资本对父亲教育水平处于较低和中等水平的男性学生的积极作用更大<sup>[10]</sup>。卡米其和卡特坎普的研究则发现,比起占主流位置的白种人,文化资本可以为处于劣势的少数群体(尤其是黑人群体)提供更多阶层流动的路径<sup>[11]</sup>。

将视线转移到国内,文化资本的影响同样具有复杂性。胡雪龙、康永久的研究发现,农村家庭强调的“本分”在学业成就中起着积极作用<sup>[12]</sup>。程猛、康永久的研究发现,底层子女取得

高学业成就的原因在于充分利用了包括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在内的底层文化资本<sup>[13]</sup>。安超、王成龙研究发现,底层的劳动生活涵养了劳工家庭子女踏实、勤劳、吃苦、隐忍、心存敬畏、有付出才有回报等尊重“劳作”的心性品质,帮助他们适应马拉松式的现代教育,倾向于“大器晚成”<sup>[14]</sup>。与之相反,郭丛斌、闵维方的研究则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处于优势社会阶层的家庭更容易获得高等教育<sup>[15]</sup>。这也就是说,文化再生产模型和文化流动模型是并存的<sup>[16]</sup>,而且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很复杂。因此,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必须与具体的实践情景相结合才能判明其作用。

再将目光从整体的人生历程集中到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的入学并不是人生的终点。而现阶段,学者对于高等教育入学后的研究却普遍认为,对来自底层的学生来说,文化资本的作用是负面的。秦慧民、李燕娜的研究就认为,农村背景大学生的最大弱势不在于经济资本而在于文化资本<sup>[17]</sup>。吴燕华也认为,农村贫困大学新生的大学适应水平不良是由文化资本匮乏导致<sup>[18]</sup>。事实真的全然如此吗,文化再生产与流动之间的张力真的无法弥合或者毫无交集吗?现实中仍旧有部分底层大学生在大学里自律勤俭、刻苦奋斗,取得了较高的学业成就和较好的发展机遇。因而仅仅关注教育在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一部分底层大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取得优异成就的可能性,最终导致无法发现潜藏在底层文化中打开优异之门的文化钥匙。

## 二、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探讨底层文化对于大学生学业成绩和获得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本研究采用质性研

究的方法,对研究对象展开深度访谈。研究对象主要为地方综合性大学 H 大 2016—2017 级 10 名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的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为区别于西方社会中“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二分法,并使研究更符合国情,本研究对“底层”的界定引入了陆学艺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层次划分,“底层”主要指的是父母一方或者父母双方是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或城乡无业和失业、半失业者等排在底端的从业者<sup>[19]</sup>。

具体来说,选取访谈对象的标准是申报了贫困生、家庭社会地位较低、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底层生活并且在学业成绩上表现优秀<sup>①</sup>的学生。访谈内容包括被访谈者的家庭背景、教养方式、成长历程、大学入学体验、大学生生活经历、职业规划设计、未来发展预期等内容。10 位访谈对象的简介如表 1 所示。

表 1 访谈对象简介<sup>②</sup>

编码	籍贯	家庭经济来源
A-F-1	四川	父母务农,外出打工
A-F-2	山西	父亲打工,母亲做超市营业员
A-M-3	内蒙古	父母务农,外出打工
A-F-4	山西	父亲做建筑工人, 母亲做保洁员
A-M-5	贵州	父母卖水果
A-M-6	四川	父母务农
A-F-7	甘肃	父母务农,外出打工
A-M-8	安徽	父母种茶,卖茶叶
A-M-9	甘肃	父母经营一家花店
A-F-10	广东	父亲退休,母亲未从事工作

应该说,选取研究对象的“优异”标准最开始主要建立在学业成就上,但随后的研究却展现了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在社会交往、发展规划等方面所展现出的独特品质。因此,访谈资料的分析主要来自底层家庭大学生的社会交往、学业成就和发展规划等方面遭遇的困难及其成长经历入手,着力把握其在成长经历中生成的底层文化品质,并将其与这些学生的社会交往、学业成就和发展机遇有机连接起来,以期找到能够打开优异之门的底层文化钥匙。

### 三、底层大学生的生活图景

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在经历了高考的厮杀,走进期待已久的大学时,却惊讶地发现大学生涯与他们的想象并不完全一样。当他们积极地向城市文化靠拢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与中产阶级子弟之间似乎隔着一层无形的墙;在大学这个新场域中遭遇的迷茫和未知令他们苦闷却又难以纾解;甚至在即将毕业时,他们还发现就业环境与他们心中美好的理想相去甚远。

#### (一) 社交排斥:走不进的“圈子”

进入大学后,一些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迅速地陷入了对陌生的大学生活的迷茫与挣扎之中。比起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对于大学文化场域显得更加格格不入。其背后的原因除了对于新环境的适应需要时间之外,大学所处的城市与他们从小生活的环境之间的差异和所塑造的不同社交模式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班级不仅是学习场所,也是社会关系场,或

①这里将获得较高的学业成就操作为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大学阶段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选规则为按照成绩排名依次从贫困生中选取,因此对学业成就具备较好的解释性。

②访谈编码方式为:A+性别+序号。访谈编码以 A 开头,男性编码为 M,女性编码为 F。为充分保护被访者隐私,对经济来源进行了部分模糊处理。

者说是人与人产生连接、共同生活学习的场所。中小学时代,班级人数固定且活动形式单一,教师、同学关系相对稳定,衡量学生优秀与否的标准主要是成绩。因此,此阶段学习成绩的优异来自底层的学生莫大的信心和勇气<sup>[20]</sup>。进入大学以后,学校的运转模式不再以成绩为中心,与之相对应的,在运动会、文艺活动、社会活动中出彩,才更容易获得同辈的认可,学习反而成了只有在考试时才会提及的话题。以舞台展现为例,比起中产阶级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从大学之前就已积淀起的文艺才能和在会上侃侃而谈的信心,大多数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还没有学会当众展现自己的才华,甚至他们往往还没上台就露了怯。这当中,击败他们的是自信心的缺乏。一次出丑经历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极为深刻的负面体验,这种体验会被反复咀嚼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久而久之,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更可能选择远离舞台上的社交圈子。

“我一直不太擅长和别人交往,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兴趣爱好。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没有培养什么艺体特长,同学们都去参加的文娱活动我也不会。有一次班里抽到了我上台唱歌,我一开口大家就都笑了,我唱歌确实是不好听,以后我就尽量避免上台表演了。”(A-M-8)

更加令人难以启齿的事情也会发生在需要消费的社交活动中。例如,在咖啡馆讨论科研项目、班级聚餐或郊游、同学邀请去看电影等城市文化下顺理成章的行为却给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出了一个难题: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生活费并不允许他们经常有这些消费行为。久而久之,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也逐渐把自己隔离在了中产阶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学生的圈子之外。

“业余时间(我)除了学习之外,也没有其他事情了。有次班长组织班级去冰雪大世界玩,我想了想最后还是没去,毕竟门票就要300块钱。每年国庆节,大家有的出去旅游,有的回家,我家

离得比较远,也没钱出去旅游,就什么地方都不去了。”(A-M-8)

综上,客观上的文体技能不充分、物质条件窘迫和主观上的羞怯、自我反刍等原因共同导致了来自底层的学生走不进一些“社交圈子”,从而导致了城市文化场域下的社交圈子成为这些大学生夹杂着期待、不屑等复杂体验而最终远离的东西。这既是外界的排斥,也是来自底层学生的“自我放逐”。而这种现象无疑会影响他们大学时期的生活体验,甚至会阻碍他们对大学生活的适应性并削弱他们从大学社会网络中获取支持力量的可能性,最后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在大学阶段的迷茫和无助感。

## (二)情感支持:可望不可求

对于新环境中产生的迷茫、困惑和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却难以获得父母的有效情感支持。安妮特·拉鲁曾如此描述:成年人和孩子之间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而不是成年人给出理由来说服孩子们做事情<sup>[21]</sup>。在这种交往模式下,安妮特·拉鲁认为这些家庭的孩子在同伴面前轻松自如,对长辈抱有的态度却是尊重和深深的敬畏。由于在家庭代际生活中没有养成良好的有效沟通的习惯,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很少与父母开口谈论自己的迷茫和无助。没有交流,有效的情感支持也就自然不会来到。

“有一点遗憾。刚刚进大学,没有什么人教,走了不少弯路,现在看起来觉得挺可惜的。有时候想和父母聊聊自己学校里的烦心事,话到了嘴边,感觉就像挂住了一样。转念一想,他们工作已经很辛苦了,哪能奢求那么多呢,还是算了吧。”(A-M-5)

即使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试图向父母打开心扉寻求情感支持和帮助,但受限于生活经验和语言编码形式,父母很难给予他们有效的情感支持。伯恩斯坦把语言分为精密性语言和局限

性语言两种,精致语言编码经过规范和系统性训练,具有普遍性意义和情景独立性的特点,因此可以进行超越自身认知经验的交流。而劳工阶层的家庭操持的大多是局限性语言编码,往往语句简单并具有特殊性,因此其具体的意义解释需要依附于情境<sup>[22]</sup>。劳工家庭的语言编码形式实质上反映了父辈很难对子女在大学里的体验有着超越自身日常经验的理解,子女在与父母交谈时,也就很难涉及有共同认知的日常生活之外的东西。

“父母的支持主要也就是和我说话,说深了他们可能也不理解,他们经常说‘只要你们过得好’。再往深了说,就感觉那边长久没有回音,想想还是聊聊今天在食堂吃了什么吧。”(A-F-4)

由于交流模式和语言编码形式中始终缺乏支撑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与父母进行深度交流的条件,所以当他们在父辈不曾涉足过的领域里遭遇困难时,他们只能独自面对。

### (三) 生涯落差:未曾谋面的职业市场

高校扩招、就业市场中的结构性矛盾等因素给大学生带来了就业危机,寻找一份满意的工作成为横亘在每一名大学生心头的重担。而上完大学、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这也是来自底层的学生及其家庭的期待之一。但与中产阶级家庭拥有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甚至从初中、高中阶段就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职业规划的指导从而避免其阶层跌落不同的是,不少底层大学生的生命道路是未经规划和指导并且十分盲目的。

“我的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上一辈里面一个大学生都没有。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大学毕业之后该怎么找工作,我只有靠自己慢慢摸索。也许我将来摸索出来了,我的下一代就能不那么盲目了。”(A-M-5)

由于父辈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底层大学生了解大学生活的渠道非常狭窄,他们对于大

学、所学专业以及未来就业前景的了解大都来自互联网和电视,或者亲戚、朋友,甚至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模糊印象。对于他们而言,真正的就业市场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当面纱被揭开之时,他们已经失去了选择的空间。

“那个时候获得的信息没有那么多,不知道读什么专业才好就业,看别人大学毕业出来挣的钱挺多,就觉得也没有什么难的。临到要毕业的时候,才真正觉得找一份好工作真的很难,有时候甚至觉得拿的奖学金、荣誉证书根本没什么用。”(A-F-2)

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影响学生专业选择的实质因素不是兴趣和努力,而是社会地位:女生社会地位越低,其专业选择的可能越受限制。比起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 and 商人的子女,工人和农民的学生选择师范类和文理科等收入回报率更低的专业的比例更大<sup>[7]</sup>。其深层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社会经济条件上的差异,还在于这些家庭意识不到学生耗费更多成本和精力以选择优势专业的价值,最终导致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被显性上经济回报更低的专业“收容”。因此,在真正面临职业市场筛选时,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也就真实地感受到了理想期待与实际生涯之间的落差。

“以前看刑侦,就是电视剧《重案六组》之类的,觉得警察是很好的职业,后来报法律专业,但没有录上,被调剂来了心理。当时也没有多想,觉得这样勉强也可以接受吧,如果在家里(高三)复读再多上一年学,感觉会给家里带来更大的负担。”(A-F-2)

“道听途说”得到的对专业的模糊印象和盲目急迫的专业选择,实质性地降低了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在专业选择和未来预期发展之间构造一条真实桥梁的可能性,让面临毕业去向选择的他们遭遇严重的危机,从而深刻地考验了他们在面对抉择时的心性品质,并逼迫他们做出属于

自己的人生规划。

## 四、走出困境的自我重塑

面对期望与现实的巨大差距,置身其中的底层大学生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其中有部分学生长时间地沉溺于社会环境转变、社交圈子排斥带来的不适或者困于情感支持缺乏的窘境之中,又或者在遭遇毕业危机时手足无措,从而影响了他们自身长远的发展。但也有部分来自底层的大学生在自我磨炼之中逐渐走出了困境,而此时,迈向优异的底层文化钥匙也开始浮现。

### (一)“对得起”:裹挟负罪感的进取心

对于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来说,当开始大学生活时,他们除了感受到迷茫和自己的不足外,也会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努力的重要性。与以往对好成绩的追求不同,现在努力学习的动力更多了一层夹杂着负罪感和触底反弹的情绪张力。在这种动力的影响下,虚度时间是不被允许的。除此之外,由于目睹了太多父母生活的辛苦和艰难,这种动力更加上了一层对父母辛苦劳累而产生的“要对得起父母”的复杂情绪。

“自己一天要是不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就会特别焦虑,感觉这一天仿佛白过了。想想父母,每天在地里工作那么辛苦,可他们从来没让我干过农活。他们觉得我在大学里一定非常努力,可是我却荒废时间,这样一想负罪感什么的都来了。”(A-M-3)

“一天要是闲下来就会特别空虚,会有罪恶感。有罪恶感就会有进取心,这么想想我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只有那些意识不到的人才是最可悲的。”(A-M-8)

这种复杂的“对得起”思维和情绪不仅仅适用在这些学生对待父母时,同时当这种情绪迁移到其他人身时,会让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更珍视

身边人对自己的友好和善良。以老师为例,尽管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在面对师长时经常显得羞涩而局促,但是这种羞涩的情绪和“投桃报李”的朴素信念也会帮助他们与师长建立另外一种情感通道的连接。怀着对教师给予机遇的感激之情,他们也会更加努力地学习,竭尽全力以求拿出更好的成果,从而在另外一个维度上让教师对于真挚的他们有了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把握,从而不吝惜给予他们更多的指导。

“实验室老师对我们特别好,在实验室工作到吃饭的时候老师就会给我们点外卖。外卖来了,老师就说:‘你在这儿,我给你们去取。’老师还给我们其他很多指导,生活上也对我们特别照顾。每次打比赛忙起来的时候,就会和上课或考试的时间冲突,老师就给我们串课,也会和学院打招呼改考试的时间。老师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如果做不好就感觉特别对不起老师的付出。”(A-F-7)

裹挟着负罪感的进取心来源于对于生活中友善之人的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情同样反作用于日常生活中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对待他人的态度上,让每一个与他们交往的人感受到一份真挚的情谊,并在类似的情感中超越他们局促的语言表达,增进旁人对于他们的认知和理解,最终帮助他们打开封闭的内心世界,走出社交圈子的壁垒。

### (二)守拙:刻苦努力的惯性优势

出人意料的是,面对全新的专业学习,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们在中小学阶段养成的刻苦学习的习惯有助于他们走出迷茫,在自我与实践的融合之中创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面对大学学术场域下全新的学习模式,在对专业前景以及自我发展感到迷茫时,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身惯性优势可能带来的价值,但随之而来的考试和压力却激发

了他们在先前生命历程中早已养成的惯性优势。惯性的思维促使他们先努力做出优秀的成果,再去思考成果背后的价值,这种看似笨拙的思维却为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良好结果。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考个高分呗,和以前一样。考试不考高分怎么行呢?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最后能拿到年级第一,这是很意外的结果,最开始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就只是觉得课程很难但我必须搞懂它。对实验室的工作也是这样的,总是想把实验室的工作做到最好,其他的东西是以后的事情了。”(A-F-7)

正如前文提到的,专业的选择并非来自个人兴趣<sup>[7]</sup>。从比例上来说,确实更多的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选择了自己不感兴趣或者显性经济回报处于劣势的专业。但不少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并没有为类似的困境所局限,而是在兢兢业业完成工作和学业并取得成果的同时,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最后在有限的空间里尽量开发着自己的潜能和价值,并将刻苦努力的成果与自身的价值意义相融合,从而获得了更为长久的驱动力。

“大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学习吧,和高中的生活差不多。感觉自己理论能力比较强,实操能力比较弱。例如,在老师说PPT上这个人最近心情郁闷,如果你是他的心理咨询师你该怎么办时,同学们反应都很快,我就慢一点。感觉自己科研能力比较强,适合搞研究,尝试了一两次之后发现研究确实挺有意思的,就想往深处走一走。”(A-F-2)

总之,在学校场域中获得认可的底层文化钥匙,其实并非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已经意识到并用以自我修炼从而获得成功的武器,而是其随着情境的转换自然生成的惯性选择。比起严格规划和步骤严密,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可能是在一个拙朴的历程中感悟和适应,并最终找到自己的价值。

### (三)精打细算:个人发展的权宜智慧

教育的技术—功能论认为,在工业化社会中,由于技术的增长、进步和正规教育对于专业技术和一般能力训练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事一份优质的工作需要更高的条件,并与之相对应地要求年限越来越长的教育<sup>[23]</sup>。类似的观点遭到了包括柯林斯在内的诸多学者的批判。柯林斯认为,不断延长的教育年限及其背后的教育文凭本质上是中产阶级文化群体用以筛选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大学毕业生的工具<sup>[24]</sup>。文凭膨胀背后的原因虽然存在争议,但是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却是公认的事实。

在文凭膨胀的大背景下,林玲根据调查提出,经济条件大大限制了第一代大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职业选择的范围,因为“没钱”等原因,根本不敢参与出国交换、就读研究生等学术资本的争夺<sup>[25]</sup>。但事实真的完全如此吗,经济资本的局促和紧迫会完全切断底层大学生向上流动的设计和规划吗?

在访谈中发现,经济基础的困窘确实给寒门子弟向上攀登教育阶梯带来制约,但也同时启发了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及其家庭在经济局限条件下的权益智慧。具体来说,学生父母一般都有着希冀孩子能尽可能地接受更多教育从而实现更好的发展的理念。这种理念折射到这些大学生身上时,便是对于父母经济支持的信任以及审慎使用金钱时的把握和自信。

“肯定还是想要读研的嘛,但是家庭的经济压力也是要考虑的。我一开始就会和父母商量,也会考虑到父母的压力。只要一读研,不但没有办法给家里挣钱,还可能要花家里的钱。我妈说:‘只要你权衡好了利弊,家里虽然没有钱,但父母这点本事还是有的,你们不用操心上一辈的事情。’”(A-M-5)

有赖于国家完整的大学生资助制度和体系,

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虽然在深造过程中会遭遇更多的经济压力,但类似的经济压力大多并未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范围。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压力,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奋发自强的动力,从而将君子“自强”“弘毅”的精神镌刻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之中。

“读研的话会有经济压力的,但是有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嘛。助学贷款没有利息,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现在家里贫困没有什么不好,现在贫困不代表以后贫困,就是相信自己将来一定能

为家庭创造更好的条件。”(A-M-3)

总的来说,尽管比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的大学生,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在毕业阶段时缺乏更为丰富和全面的选择,并遭受着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但正如学者程猛所说,有不自在和不自如就会有克服这些不自在和不自如的努力,不自如并非与生俱来,克服它的过程恰好也是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过程<sup>[26]</sup>。在个人发展和经济局限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后映射的“权益”智慧、在适当压力下激发的“自强”“弘毅”的奋斗精神反映了克服不自如的努力,也会为他们增添更多面对未来生活中挑战的勇气。

## 五、迈向优异:文化密码的串联

### (一) 打开优异之门的文化钥匙

事实上,打开高等教育优异之门的文化钥匙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裹挟着负罪感的进取心、刻苦努力的惯性优势、个人发展的权益智慧支撑着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度过初入大学的迷茫,并在经济窘迫、文化不适应等不利条件下,帮助他们在未知中超越自身家庭经济条件和认知视野的局限性,从而实现更好的自我成长与社

会认知的提升。

其中,对得起父母的辛勤汗水、对得起师友的友善和关爱,不能虚度时光的“对得起”思维帮助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度过刚开始进入大学阶段的迷茫和不适。在陌生的文化场域里,“投桃报李”的责任感则要求他们必须认真地对待任何每一份善意,这也为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提供了原初的动力。当这些大学生面对学业的压力时,刻苦努力的惯性优势会被他们带到大学场域里的学习和科研工作上来,并帮助他们在其中寻觅自身的价值,度过充实而完整的大学四年。个人发展的权益智慧则帮助他们在面临生涯落差时尽快地走出阵痛,重新调试和定位自己,从而帮助他们更乐观地面对未来生活挑战。

### (二) 对文化资本理论的反思

当我们审视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成长经历时可以发现,这些学生并未完全接受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符应,而是走出了带有“决定论色彩”<sup>[27]</sup>的再生产命运。事实上,有趣的是,提出文化资本理论的布迪厄本人也是从法国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庄成长起来,通过进入巴黎高师学习才构建起文化资本的理论大厦。刘精明老师曾半开玩笑地说道:“或许教育社会学要认真清除‘布迪厄病毒’<sup>①</sup>。”这或许是对过度关注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因而丧失了对这一现象提出其他具有解释力理论现象的一种调侃。但是,确实应当关注到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成长历程之中那些文化资本概念之外的东西。

事实上,回应这一难题的其他答案并不鲜见。在布迪厄的学说体系之中,就隐藏着一些不同于文化资本概念的产物。但由于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工具的光辉过于夺目,使得这些产物成了

<sup>①</sup>来源于2020年12月清华大学教育社会学博士答辩时刘精明教授的讲话。



被遮蔽的遗珠。布迪厄在创造文化资本理论的同时,也创造了“惯习”这一概念。“惯习”来自生产而非继承,是后天“通过经验获得的性情”<sup>[28]</sup>。后续学者的研究证明,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积极影响是以“惯习”为中介的<sup>[29]</sup>。由此可见,文化资本是“惯习”生成的土壤,但却不是学业成就的直接决定因素。“惯习”或者说“通过经验获得的性情”不是与文化资本完全一致的事物,其生成的具体形态和样式受到不同的家庭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去参加音乐会并不代表所有的听众都占有了音乐文化,唯有熟稔这些作品内在逻辑的观众才是真正的占有者。”<sup>[30]</sup>显然,本研究所发现的底层文化钥匙更类似于在具体化情境中互动生成的“惯习”。

事实上,布迪厄也承认学校种类、教师和课程等教育要素在文化资本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但在其笔下,法国的学校成了社会高等级“淘汰距离学校最远的那些阶级”的工具。但即使如此,依然可以看出,“通过经验获得的性情”是一个在不断与学校场域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正如程猛的研究发现,中国来自底层家庭的子弟与学校文化的距离并不远<sup>[13]</sup>。“不论乱、治、兴、亡,不断地有一批批人永远在维持着这种道。”<sup>[31]</sup>“取士不问家世”的中国学校、教师自古以来便对这些寒素子弟的求学怀着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为“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得读书灯”之学子提供了生存和成长的土壤。也正是在这种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下形成的学校场域,可以允许寒门子弟怀着对学校、教师和教育的敬重,充分挖掘自身的文化基因,找到那些被我们称之为底层文化钥匙的东西,并在与学校制度、文化场域的互动过程中,发挥底层文化钥匙的强大力量,并使得这一学校文化情境得以绵延,为后来者指引新生的希望。

### (三) 进一步的讨论

虽然本文从寻觅优秀的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身上携带的促使自身发展的文化钥匙中,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体系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但从客观的视角来看,仍不能忽视那些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因未能走出初入大学时的困窘和不适而影响了自身长远的发展。因此,要进一步推进高校奖助学金、学校勤工俭学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以给予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不被高等教育淘汰的物质性保障。另外一方面,也要意识到实现自身发展的钥匙最终掌握在这些学生自己的手里,只有在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并与大学文化良性互动的基础上,优异的成就才有可能实现。

### 参考文献:

- [1] 李忠路,邱泽奇. 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16(4):121-144,244-245.
- [2] 杨洋. 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基于 PISA2012 的经验分析[J]. 现代教育科学,2016(6):56-61.
- [3] 熊静,单婷,钱梦菊. 农村青少年的辍学行为研究——基于家庭文化资本的视角[J]. 中国青年研究,2016(3):49-55.
- [4] 张雯闻,黄绮妮,万杏. 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学业成绩:基于上海 PISA2009 的实证研究[J]. 当代教育科学,2016(18):29-33.
- [5] 郑雅君. 谁是 90 后名校优等生——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关系的个案研究[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5):69-81,127-128.
- [6] 闫西安. 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及其实践价值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 [7] 布尔迪约,帕斯隆.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 邢克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13,224.

- [8] ASCHAFFENBURG K, MAAS I.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areer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4): 573-587.
- [9] JAEGER M. Equal access but unequal outcomes: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choice in a meritocratic society [J]. Social Forces, 2009(4): 1943-1971.
- [10] DIMAGGIO P.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2(2): 189-201.
- [11] KALMIJN M, KRAAYKAMP G. Race,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ing: An analysis of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6(1): 22-34.
- [12] 胡雪龙, 康永久. 主动在场的本分人: 农村学生家庭文化资本的实证研究 [J]. 全球教育展望, 2017(11): 104-116.
- [13] 程猛, 康永久. “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言说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6(4): 83-91.
- [14] 安超, 王成龙. 经验回溯与文化反思: 劳动阶层研究生的群体叙事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8): 59-65.
- [15] 郭丛斌, 闵维方. 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6(11): 24-31.
- [16] 吴愈晓, 黄超, 黄苏雯. 家庭、学校与文化的双重再生产: 文化资本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J]. 社会发展研究, 2017(3): 1-27, 242.
- [17] 秦惠民, 李娜. 农村背景大学生文化资本的弱势地位——大学场域中文化作为资本影响力的视角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4(4): 72.
- [18] 吴燕华. 农村贫困大学新生适应困境研究——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的视角 [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 85-86.
- [19]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7.
- [20] 程猛. 农村出身: 一种复杂的情感结构 [J]. 青年研究, 2018(6): 64-73, 93.
- [21] 安妮特·拉鲁. 不平等的童年 [M]. 张旭,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4.
- [22] BASIL BERNSTEIN. Linguistic codes hesitation phenomena and intelligence [J]. Language and Speech, 1962(1): 31-45.
- [23] 张人杰. 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45.
- [24] 兰德尔·柯林斯. 文凭社会 [M]. 刘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82-83.
- [25] 林玲, 彭曦. 我国第一代大学生的生涯规划特点研究——以上海 8 所高校为例 [J]. 大学(研究版), 2016(12): 49-61, 48.
- [26] 程猛.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 [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2017.
- [27] 朱伟珏. 超越社会决定论——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再考 [J]. 南京社会科学, 2006(3): 87-96.
- [28] 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 [M]. 包亚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0.
- [29] GADDIS S M. The influence of habitu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apital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3(1): 1-13.
- [30] 洪岩璧, 赵延东. 从资本到惯习: 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 [J]. 社会学研究, 2014(4): 73-93, 243.
- [31] 钱穆. 中国历史精神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151.

(责任编辑:程德兴)